

抗战时期国军各阶层成员出身背景及素质的分析

张瑞德

军队对于国家现代化的影响是利或弊,一直是西方学界讨论得非常热烈的一个题目,正反两方各执一词,迄无定论。不过在讨论军队与现代化的关系之前,必须先对军队本身成员的出身背景及素质有所了解,方能作进一步的探讨。此外,军队成员素质的好坏和军队战力的高低,更有直接的关系。一支军队如果成员素质低弱,即使部队的人数众多,其战力也不能强大。本文拟将抗战时期的陆军军官分为高级(将级)军官和中、下级(校、尉级)军官和士兵三类,对其出身背景和素质分别加以量化分析,以作为进一步讨论的基础。

一 高级军官

(一)出身背景分析

研究抗战前后国军将级军官的人事问题,最完整且最权威的原始名册,应为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编制的《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名簿》(1936年出版),收录有1247名陆军将领资料;以及国防部第一厅所编的《现役军官资绩簿》(1947年出版),收录有陆军将级军官3274人。根据以上两种资料,我们可以为抗战前及抗战后期的将级军官,各画出一幅素描。

表1 陆军将级军官出身背景统计(1936)^①

出身/官阶	总计(%)	上将(%)	中将(%)	少将(%)
黄埔	92(7.38)	0(—)	17(3.65)	75(8.19)
保定	388(31.11)	8(25.81)	95(31.56)	285(31.15)
留学	159(12.75)	6(19.35)	51(16.94)	102(11.15)
陆大	215(17.24)	2(6.45)	43(14.29)	170(18.58)
地方军校及行伍	393(31.52)	15(48.39)	95(31.56)	283(30.93)
总计	1247(100.00)	31(100.00)	301(100.00)	915(100.00)

表2 陆军将级军官出身背景统计(1947)^②

出身/官阶	总计(%)	上将(%)	中将(%)	少将(%)
黄埔	1150(35.13)	1(2.70)	76(11.88)	1073(41.31)
保定	280(8.55)	14(37.84)	97(15.16)	169(6.51)
留学	284(8.67)	10(27.03)	67(10.47)	207(7.97)
陆大	1197(36.56)	3(8.11)	337(52.65)	857(33.00)
地方军校及行伍	362(11.06)	9(24.32)	63(9.84)	290(11.17)
不详	1(0.03)	0(—)	0(—)	1(0.04)
总计	3274(100.00)	37(100.00)	640(100.00)	2597(100.00)

从以上二表,可以发现以下几项现象:

第一,战前陆军的将官出身黄埔者极少,且出身黄埔的比例乃是随着阶级高低成反比。至1947年,将官出身黄埔者已有显著增加,其比例也是随着阶级的高低而成反比,少将出身黄埔者已占多

① 资料来源:根据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编:《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名簿》第一册(南京:编者印行,1936年),第1—138页,收录资料计算得出。

② 资料来源:根据国防部第一厅:《现役军官资绩簿》(南京:编者印行,1947年),第1册—第4册,收录资料计算得出。

数(出身陆大及外国军校者,也多系黄埔毕业)。

第二,战前陆军将官出身保定者颇多,约和出身地方军队及行伍者相当;将官以中将和少将较多,上将则较少。上将多出身清末民初各种军事学堂。抗战结束后,将官出身保定者,已显著减少,少将出身保定者尤少,原因为保定军校已于1923年停办。

第三,将官出身陆大及国外军校者,不论是战前或战后,比例均小。

第四,将官出身地方军队及行伍者,在战前约和出身保定者相差无几,上将出身地方军队及行伍者尤多。至抗战结束后,将官出身地方军队及行伍者,已大为减少。

以上系抗战时期将官出身背景的一般趋势。以下拟再就陆军重要军职人员(战前的各路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和战时的战区正副司令长官、集团军正副长官、军长、师长)的出身背景加以分析。

表3 战前陆军重要军职人员出身背景统计^①

出身/职称	各路军总司令	军长	师长
黄埔	0(0%)	7(10%)	20(11%)
保定	4(67%)	25(35%)	36(20%)
留学	0(0%)	1(1%)	6(3%)
陆大	0(0%)	2(3%)	9(5%)
地方军队及行伍	2(33%)	35(49%)	63(36%)
不详	0(0%)	1(1%)	43(24%)
总计	6(100%)	71(100%)	177(100%)

① 资料来源:根据刘凤翰,《战前的陆军整编》,收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编者印行,1984年),下册,第675—695页;刘凤翰,《抗战前明国军之扩展与演变(陆军部份,一九三七.七—一九四一.八)》,收于: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研讨编辑委员会编,《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台北:编者印行,1991年)二文所附名单计算得出。

表 4 陆军重要军职人员出身背景统计 (1944)^①

出身/职称	战区正副司令长官	集团军正副总司令	军长	师长
黄埔	1(3%)	31(33%)	40(36%)	132(42%)
保定	18(50%)	36(38%)	37(33%)	48(15%)
留学	4(11%)	5(5%)	0(0%)	0(0%)
地方军校及行伍	13(36%)	23(24%)	34(31%)	101(32%)
不详	0(0%)	0(0%)	0(0%)	33(11%)
总计	36(100%)	95(100%)	111(100%)	314(100%)

从以上二表,可以发现以下几种现象:

第一,战前重要军职人员出身黄埔者极少,各路人总司令中无一人系黄埔毕业,军长、师长中也只有约十分之一是出身黄埔。至抗战后期,战区正副司令长官中只有一人系黄埔毕业,以下的重要军职人员,出身黄埔者已有显著增加,且职务越低的重要军职人员出身黄埔的比例越高,如集团军正、副司令中有 33% 毕业于黄埔,军长和师长中则各有 36% 和 42% 出身黄埔。

第二,战前重要军职人员出身保定者颇多,且职务越高者,出身保定者越多,如各路人总司令中出身保定者占三分之二,军长中出身保定者占 35%,师长中出身保定者占 20%,至抗战后期,也有类似的现象。战区正、副司令长官中有 50% 出身保定,集团军正、副司令中有 38%;至军长阶层只有 33%,比不上出身黄埔的多,至师长阶层,更只占 15%。

① 资料来源,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p. 230. 作者所根据的资料为《陆军军官佐绩簿》(1944),其中军、师长无一人系留学归国者,统计数字疑有误。

第三,重要军职人员出身陆大及国外军校者,不论在战前或战时均少。

第四,重要军职人员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者,不论在战前或战时,均在三分之一以上,显示战时重要军职人员素质的提升有限。

(二)成员素质的分析

综合以上对于抗战前后陆军一般将领及重要军职人员出身背景的分析,可以发现以下几项趋势及涵义:

第一,抗战期间陆军将领有“黄埔化”的趋势,战前保定所占的重要地位,战时逐渐为黄埔所取代,在军长、师长阶层,这种趋势尤为明显。抗战时期出身黄埔的将领,大多毕业于前几期,当时黄埔的训练相当粗浅,时间也短,所学到的专业技能自然有限。

第二,抗战期间陆军将领(含重要军职人员)出身地方军校及行伍的比例,均有降低的现象,显示战时将领的素质有所提高。在各兵种中,以特种兵将领的素质较差,如主管后勤业务的将领,绝大多数毕业于直隶经理学堂(民国以后改为陆军军需学校),然后在北洋部队任职;骑兵和通讯兵的将领,也绝大多数是出身北方部队的旧式军人。^①这些出身地方军校或行伍的将领,或许极为勇敢、战场经验丰富,但是对于现代战争的性质,却普遍缺乏认识。

第三,抗战期间陆军将领出身国外军校者甚少,而且多系一次大战期间或一次大战前出国留学学者,因此对于一次大战以后的军事科技和战略,多未能有深刻的认识。^②虽然如此,出身日本士官的将领所受训练,一般说来仍较其他将领为扎实。

第四,抗战期间陆军将领出身陆大者也甚少。陆大为国军深造教育的主要机构,但是毕业人数有限。据统计,至抗战结束时,陆大毕业军官在军中共 2100 人,分布如下:1. 中央军事机构约有 600

①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Military Defeats and Political Collapse, 1937-1945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2), p. 66.

② Ibid, p. 66

人,其中以陆大及所属的参谋训练班人数最多。2. 战斗序列各单位共约 1500 人,其中每一战区司令部约有 10 人,每一集团军总部约 3—5 人,每一军司令部约 3—5 人,每一师司令部约 2—3 人,兵站机关共约 120 人左右。^① 陆大所学者,以师战术为主,对大军作战的指挥作业磨练较少,对军事作业以外的政治作战、经济作战、心理作战,更无暇研究。至于陆大毕业生担任参谋职务者的表现,一般认为陆大出身的参谋长或参谋处长、主任,指挥多比较得体。^②

抗战时期的陆军将领,自离开学校后,除了短期的训练班队外,很少有人能够有机会继续接受兵科学学校和陆大的正规深造教育。此外,国民革命军自成立以后,由于连年作战,因此升迁容易,常是一战一升官,也减少了历练的机会。战前德国顾问对国军此种快速升迁的方式即引以为忧,多次向委员长陈述,认为一个军人如果不先任下级军官,遍充排、连、营、团长各职多年,必定不能于短期之内具有高级指挥官的经验,即使是如何勇敢,也无济于事。^③ 抗战时期,由于人员伤亡大,加以部队屡次扩编,因此许多人升到将官时仍很年轻。据统计,1944 年时,陆军一般高级将领,年龄大多在 50 岁以下,有些总司令、军长、师长的年龄,甚至只有三、四十岁,而当时日军一般将官的年龄,则大多在 50 岁以上。^④ 少年得志,自然容易产生骄傲自满、不求进步的毛病。

抗战后期,美国先后派遣来华的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对于国军高级军官的素质,即每多表示不满,如他在 1942 年 5 月 26 日呈委员长文中即曾表示国军军官的素质和其阶级、职务成反比:“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长和团长的素质不一,但是

① 杨学房,《陆大沿革史编后感言》,见杨学房、朱秉一编,《中华民国陆军大学沿革史》(台北:三军大学,1990 年),第 284、285 页。

② 《审核第二次视察部队参谋报告书》,油印本,1941 年,第 12 页,收于军令部档案,档号 769/2217。

③ 《德国军事顾问佛采而关于整顿中国军队致蒋介石呈文两件》,《民国档案》,1988 年第 4 期,第 39 页。

④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 230.

不乏优秀之士。在这些阶层要将缺乏效率者淘汰较为容易,擢优弃劣后,对于士气将有好的影响。至于军长和师长,则问题颇大。这些人中很少是有效率的,他们很少亲临前线,更极少监督命令是否执行。对于来自前线夸大甚至错误的报告,不经查证即予接受。经常忽略搜索和警戒的重要性,常因而造成大乱。一般的师长,似乎以为只要自距离前线五十哩处,发一命令,即已尽到责任。这些军官中,有许多是相当勇敢,但是大多数的人均缺乏道德的勇气。”^①接替史迪威职务的魏德迈对于国军高级军官的评价也甚低:“在我所接触的国军高级军官中,我发现很少能视为是有效率或是受过良好专业训练的。我并不怀疑他们对于委员长的忠诚,但是作为蒋的参谋长,我必须评估他们的作战能力和知识、他们带兵的资格,以及他们配合全盘作战计划,执行命令的意愿。”^②

外国人士坦率的批评,往往激起国人的反感,认为是有意丑化政府形象。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委员长本人对于这些批评并未否认,而认为本身应加检讨。1946年4月,他在陆大将官班开学典礼中即曾批评过高级将领。^③

事实上,早在1938年的一次会议中,委员长即已指出国军将官的学问和技能,远不如同级西方先进国家的军官,也比不上日本的军官,他甚至认为:“我们作总司令的,只比得上人家一个团长,我们的军长、师长,只当得人家一个营长和连长。”^④一般国军将领

①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 (Washington D. 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53), p. 153. 军界人士指出史迪威的批评并不正确。抗战中各大、小战役,军、师长所居位置,通常为距火线5—6华里,约为故军山野炮的射程之外;集团军总部通常设于距火线19—20华里处;至于战区司令长官部,则通常设于距战场200—300华里的重要城镇。参阅1993年1月7日胡静如先生与笔者私人通信。

② Albert C. Wedemeyer, *Wedemeyer Report!* (New York: Henry Holt & Company, 1958), p. 325.

③ 蒋中正:《整军的目的与高级将领的责任》,《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9卷(台北:编者印行,1966年),第68、69页。

④ 蒋中正:《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下)》,《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4卷,第72、73页。

也都认为日本高级将领之中,虽然缺乏出色的战略家,但在基本战术、战略原则上,均能一丝不乱,绝少发生重大错误;作事也都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①

国军将领的学问和能力不如日军,固属事实,但是我们要检讨的是原因何在?笔者认为,除了前述军事教育质与量不足、升迁过速、未能实施经历调任等原因之外,以下二项因素也不可忽视:

第一,指挥官的分外责任及杂务过多。先进国家的高级军官,平日除训练及自我充实外,别无所事,原因在于指挥官本身均受完整训练、各级干部素质相称、后勤补给制度健全、物质条件俱备,而近代中国的指挥官则无此福气。各部队长,每为“开门七件”及其他琐碎事务,终日忙碌,以至于无暇致力于教育训练,甚或以交际应酬为猎取功名的捷径,而疏忽学术。1943年,军事委员会颁布“军师长亲勤督训办法”,即系对此而发;盟军所作“中国军官地位愈高能力愈弱”的批评,军界人士也认为是其来有自,不尽为诬。^②

第二,参谋组织不够健全。学者指出,近代美军参谋本部的建立,一共花费了14年的时间。中国近代由于政治不安定、军队庞大,因此所需要的时间也就更多。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执政尚不及十年,日本即发动侵华,缺乏时间建立完善的参谋制度。直到1937年为止,陆军大学仅训练出不到2000名的指挥及参谋人才,大多数的部队指挥官均未受过陆大参谋作业的训练。^③抗战期间,国军的参谋制度才逐步建立,据一项军令部的统计显示,1940年时全国参谋学资不合者,达二分之一以上,至1942年时,仅占三分之一强。^④此时参谋的素质,如以司令部的性质加以区分,大致上

① 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539页;罗友伦,《罗友伦先生访问纪录》(稿本)。

② 蒋中正,《委座手谕》,见《万安军事会议要录》(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未注出版时间),第15页;杨安铭,《对步兵教育应有之认识》,《军事杂志》,第166期(1945年)第2页。

③ 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p. 150-151.

④ 龚作人,《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四组报告书》,第14、15页,1942年,毛笔原件,藏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号769/2220。

以集团军以上的参谋人事最为健全,军部次之。师则人才缺乏,成绩甚差,兵站总监部与分监部的参谋素质,尤为低劣。军以上的各级参谋长,大多毕业于陆大,能力尚佳,表现也不错,只是资历有不免稍差者。师参谋长多为军校出身,长于部队经验,但是缺乏运筹之材,因此师的幕僚业务,不但零乱欠缺,且较往日低落。至于各级司令部的中、低级参谋人员,偶尔也有出身短期训练班的,一般经验尚可,战术修养则不足,差堪推行日常业务,至于自动自发工作和研究发展的精神,则几乎是百无一二。^①苏联驻华军事代总顾问返国时,曾应蒋委员长之请,指出国军的缺点,认为国军“营以下的动作,大体可以说是很注意了,但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与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战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造成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于“团以上司令部人员,很多不是正式军官,而多是主官的私人,往往很重要的职务,交给一些落伍的军官或不习军事的文人来担任,参谋人员虽然有些是陆大毕业,但大多数都是缺乏实际的经验,在部队里面也没有专门业务的训练,所以人事参谋不知怎样来管人事,补给参谋不知如何来办理补给,至于军需、军械人员,更多滥竽充数,甚至于管理物品、检查物品的常识都没有!司令部的人员既不健全,司令部的业务自然无法推进”。^②一般说来,随着参谋教育的发展以及军令部人事制度的运作,参谋人员的素质,不同于其他一般军官,至抗战后期,有日渐增高的趋势。^③至1945

① 《军令部第三次参谋视察第四组报告书》,第18、19、38页。

② 蒋中正,《整军训词》,《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8卷,第208页。

③ 全国各军事机关、各部队参谋人员中,出身陆大正则班、特别班者所占比例:1939年9月为12.1%,1940年12月为10.6%,1944年9月为19.0%。参阅军令部第三厅第一处:《参谋人员统计图表》,1939年,图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军令部档案,档号769/310;军令部三厅一处:《廿九年全国各军事机关各部队参谋人员出身统计图》,军令部档案,档号769/309;三厅一处:《参谋人员各种统计图》,1944年,图4,军令部档案,档号769/310。

年时,各战区各集团军上校以上参谋,大多均出身正式军校和陆大,中央系部队的参谋,出身陆大者更多。^①不过一些地方部队,甚至直至抗战末期仍未有完善的参谋制度,而以“认识字的作参谋,不识字的制作副官”,若干参谋虽然知书识字,但仍不懂得如何使用地图。^②至于日军的参谋,由于陆大教育发达已久,以致二次大战期间仍有35%系陆大毕业^③,素质较国军为高。^④

不过,外国人士对于国军的批评,似乎较少具备同情之心,甚至带有偏见^⑤;委员长对国军的批评,则每多出于家长式的求全管教,因此言辞不免激切,且常以偏概全。平心而论,国军将领中也不乏杰出之士,如中央军的陈诚、汤恩伯、罗卓英、孙立人、关麟征、杜聿明、邱清泉等,战时均是日军的首要攻击对象。地方部队中,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在抗战爆发后,立即入京参战,整个抗战期间,李、白并且一直担负一方面的重任;西北军系统的部队,如宋哲元所指挥的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各部,以及孙连仲、孙桐萱、曹福林所部,均善于打硬仗;粤军的张发奎、薛岳等,也都是抗

① 《第三科主管各战区集团军上校以上参谋人员名册》,毛笔原件,军令部档案,档号769/280。

② 张麟序,《弹火余生述》第二册,香港文史出版社1968年版,第177页。

③ Coox,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p. 10.

④ 蒋委员长曾在一次参谋长会议中比较国军和日军的参谋素质,“大家看看敌人方面,他一个上尉参谋,派到前方,就可以指挥旅部、团部作战业务,他们参谋之精于后方勤务,更不必说了。我们现在不仅中级参谋人员,就是一般高级参谋长和参谋处长,对于指挥作战和主持业务的效能,是不是都能赶上人家的上尉参谋呢?如果我们不从这一点上力求上进,我们就不能打胜仗!外国军队之所以战斗力强大,一切组织训练与技术,能够不断进步,就是因为他们幕内有一班精明强干的参谋人员!”见,蒋中正,《参谋长会议训词(二)》,《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5卷,第308页。

⑤ 美国总统罗斯福即曾批评史迪威“明显的痛恨中国人”。史迪威在所提于印度训练中国军队的建议中,有一项建议是要将国军营长以上军官撤换,改用的办法。参阅:Luo Rongqu, "China and East Asia in America's Global Strategy, 1931-1949," in Harry Harding and Yuan Ming, eds.,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55: A Joint Reassessment of a Critical Decade* (Wilmington, De.: SR Books, 1989), p. 279.

战的中坚人物。可惜这些将领并非全获重用,后来又彼此倾轧,以至于未能建立起国军良好的高级指挥阶层。

二 中下级军官

(一) 应需状况

抗战前,中国陆军部队计有步兵师 177 师,独立步兵旅 60 旅,独立步兵团 43 团,骑兵师 9 师,骑兵旅 5 旅,骑兵团 3 团,炮兵旅 4 旅,炮兵团 18 团,炮兵营 15 营,工兵团 2 团,交通兵团 3 团,通信兵团 2 团,宪兵团 11 团 3 营,官佐共 136000 余员,士兵 1893000 余人,合计 2029000 余人。^①当抗战爆发,国军部队中有配备德制武器的一流作战部队 80000 人。^②但是淞沪一役,消耗中央的精锐部队,已超过五分之三,加以士兵程度不佳(虽然在当时已是最好的),临阵作战,全靠下级军官亲自指挥,因此下级军官伤亡尤大,几达 10000 名之多。战前十年间所训练的军官,在此一役即丧失了 10%^③,造成了基层的断层。根据 1938 年军政、军令两部的统计,每年需要培养(亦即补充)初级干部人数,约为 45000 人。^④其中四分之三以上是由各军事校班造就,其余则由行伍擢升。^⑤

抗战期间,中央军校及分校所培育的学生,在 150000 人以上,各机构又召训兵科军官 97577 人、行伍军官 84235 人,弥补了基层军官的不足。^⑥

① 刘凤翰:《抗战前期国军之扩展与演变——陆军部份(1937.7—1941.8)》,见《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第一册,第 166 页。关于抗战前陆军兵力的统计,尚可参阅陈诚:《八年抗战经过概要》(未注出版地点,1946 年),第 2、3 页;何应钦:《日军侵华八年抗战史》(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2 年),第 24—27 页。

② Claire L. Chennault, *Way of a Fighter* (New York: G. P. Putnam Sons, 1949), p. 40.

③ 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p. 147—148.

④ 白崇禧:《五年来军训重要设施之检讨》,《军事杂志》,第 149 期(1943 年 6 月),第 5、6 页。

⑤ 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p. 148.

⑥ 拙著:《抗战时期陆军的教育与训练》,见《中华民国建国八十年学术讨论集》。

(二) 出身背景分析

有关国民政府时期国军人事的详细统计资料,由于一向被列为机密,故极为罕见,笔者尽力收集,仅得二件较为完整的资料。

第一件资料为1936年1月28日美国驻华武官的一份关于中国陆军军官出身统计报告,其中收录以下二表^①:

表5 军官阶级统计

阶级	上将	中将	少将	上校	中校	少校	上尉	中尉	少尉
人数	124	418	1240	3233	4707	13178	39736	37554	36284

表6 军官教育程度统计

种类	人数	百分比	种类	人数	百分比
黄埔军官学校	43018	31.6%	外国军事学校	1922	1.4%
陆军小学堂	20033	14.7%	军医学校	1414	1.0%
陆军中学堂	11493	8.4%	特种兵科学学校	1075	0.8%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6575	4.8%	陆军大学	992	0.7%
各种军官团	5621	4.1%	兵工学校	237	0.2%
工兵学校	2175	1.6%	行伍	39744	29.1%
军需学校	2175	1.6%	总计	136474	100%

以上二表共收录上将以下,直至少尉的统计数字,报告中注明各项数字“均系出自一位军政部官员的估计。在这方面,官方从未公布过数字,因此这些数字虽然不可靠,但是在没有更好的数字以前,仍有参考的价值”。^② 不过,由于所列各级军官总数(136474),

① 资料来源:Report, Statement on Commissioned Personnel Strength and Classification as to Training. January 28, 1936. U. 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 1911-1941, Reel V, pp. 521-524. 表中各项百分比系经笔者算出。

② U. 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 China, 1911-1941, p. 521.

与国防部史政局《抗日战争史》一书所称“官佐共一十三万六千余员”^①几乎完全吻合,因此本项资料的准确性,应是相当的高。此外,根据表5的数字,将官总人数仅占有所有军官人数的1.3%,因此,表5数字大致也可以反映中、下级军官的状况。

第二件资料为军训部1945年所出版《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统计年鉴》一书中,所收录的一份统计。

表7 军训部1944年度调查陆军各部队中下级现役军官素质统计^②

程度/兵种	总计	步	骑	炮	工	辐	通	机
已受养成教育者	31274 (27.0%)	25876 (27.3%)	227 (33.8%)	1722 (48.4%)	780 (29.0%)	288 (6.8%)	2198 (21.6%)	631 (44.6%)
已受召集教育者	44243 (37.6%)	42322 (44.6%)	264 (39.3%)	423 (11.9%)	499 (18.6%)	— (—)	234 (2.3%)	443 (31.3%)
行伍	38704 (32.9%)	26662 (28.1%)	181 (26.9%)	1410 (39.7%)	1410 (52.4%)	967 (22.9%)	7734 (76.1%)	340 (24.0%)
其他	2968 (2.5%)	— (—)	— (—)	— (—)	— (—)	2968 (70.3%)	— (—)	— (—)
总计	117579 (100%)	94860 (100%)	672 (100%)	3555 (100%)	2689 (100%)	4223 (100%)	10166 (100%)	1414 (100%)

※系指其他非中央军、分各校及各兵科学校出身者

由上表的分类方式,可以看出这项统计的主要目的,在于宣扬军训部的业务绩效,不过也透露了中、下级军官的出身背景。所列数字,虽然对于养成教育和召集教育的内容均未作细分,似嫌简略,但是对于各兵科却分别加以统计,极具史料价值。

(三)成员素质

以上二件资料,虽然均存在有缺陷,但是没有更好的全面性统计数字之前,似乎仍可用以观察一般的趋势。如将以上二表作一比较,再参以其他史料,似乎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观察:

- ①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抗日战争史——战前世界大势及中日国势概要(二)》(台北:编者印行,1966年),第62页。
- ② 资料来源:总务厅编,《军事委员会军训部中华民国三十三年统计年鉴》(南京:编者印行,1945年),第43页。

第一,行伍出身的中、下级军官,比例有增高的趋势。表6指出战前军官出身行伍者占29.1%,至1944年时,表7指出中、下级军官中,行伍军官所占比例虽仅为32.9%,但是在“已受召集教育者”栏中,行伍必然也占相当大的比例。抗战后期,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甚至宣称有85%勇敢善战的军官,均为行伍出身。^①因此行伍出身的军官比例,在抗战时期有明显升高的趋势,似乎是可以确定的。

一般说来,能升为军官的士兵,每多善于作战,但是,行伍军官的缺点,则为未入过军校,相对说来,对于军官的要素——指挥能力,较为缺乏,训练部队也比不上军校出身的军官,加以知识水准较低(根据估计1935年时,有一半以上的行伍军官完全不识字)^②,因此在部队中常不被视为正途出身而遭排斥,升迁速度也较慢。^③不过,也不是没有例外的情形,如战时第二预备师师长陈明仁,虽系黄埔出身,但是并不排斥行伍出身的军官,在他手下各级指挥官中,行伍出身的约占三分之一,而军校学生约占三分之二。^④

第二,军校出身的中、下级军官,比例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表6指出,战前军校出身军官的比例为70.9%,但是表7指出,1944年时,中、下级军官中,出身正式军校者所占比例,则降为27%。^⑤至

① 冯玉祥,《冯玉祥回忆录》(上海:文化出版社,1949年),第152页;冯玉祥,《蒋冯书简》(上海:中国文化信托服务社,1946年),第123页。

② Report, Statement on Commissioned Personnel Strength and Classification as to Training, January 28, 1936. in U. S. 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 China, 1911—1941, Reel V, p. 524. 军校毕业生与行伍军官之间的心理距离,可以参阅:徐枕,《阿毛从军记》(台北:福记文化,1987年),第130页。

③ 《蒋冯书简》,第123页;《阿毛从军记》,第131页。

④ 陈瑞安,《抗日战争中的陈明仁将军》,《湖南文史资料》第28辑,第130—131页。

⑤ 另一项资料指出,1943年时,国军各部队的中、下级干部约140000人,其中正式军校出身者有37587人,约占27%,其余均系非正式军校出身与行伍军人。参阅何应钦,《对五届十一中全会军事报告(三十一年十一月至三十二年八月)》,《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下册,第562页。

于保定军校和黄埔军校在中、下级军官出身中的重要性,和高级军官相同,均有阶级越高,保定出身比例越高;阶级越低,黄埔出身比例越高的现象。如军事委员会铨叙厅所编《第一期第一届陆海空军官佐任官名簿》第1册,共收录有上校569人及中校1397人的资料。将其出身背景加以统计后即可发现,上校中出身保定者占35.7%(203人),出身黄埔者占13%(74人);中校中出身保定者占26%(365人),出身黄埔者占19%(268人)。^①

北伐完成后,由于中央政府的努力,军事教育逐渐标准化,中央军校成为初级军官的主要培养场所,学生毕业后通常均分发至中央政府的部队,例如陈诚的第十八军,从连长、排长至师长,有80%为黄埔出身。^②在德国顾问的协助下,这些军官的素质,一般认为颇高,但是数量过少。据估计,1928年至1937年之间,中央军校毕业学生仅有10731人。^③抗战爆发后,由于对军官的需求剧增,必须加速训练工作,水准自然因而下降。至于自行伍升上来的军官,虽未接受过特别的军官教育,但是在战场上常被指挥官及官兵视为比仅受过速成教育的军官更值得信赖。

第三,中、下级军官的出身背景,各兵科之间有颇大的差异。从表7可以看出,1944年时各兵科中、下级军官接受养成教育比例,依序为炮(48.4%)、机械(44.6%)、骑(33.8%)、工(29.0%)、步(27.3%)、通讯(21.6%)、辎重(6.8%),显示各兵科中、下级军官素质的高低,似乎与该兵科专业化程度(所需专门知识的多寡)相关。至于各兵科中、下级军官出身行伍的比例,则依序为通讯(76.1%)、工(52.4%)、炮(39.7%)、步(28.1%)、骑(26.9%)、机械

① 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编:《第一期第一届陆海空军官佐任官名簿》(南京:编者印行,1936年)第1册,第41—247页。

② 刘福祥:《“小委员长”陈诚》,见王维礼编《蒋介石的文臣武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9页。

③ 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黄埔军官学校校史简编》(台北:编者印行,1986年),第180页。

(24.0%)、辍重(22.9%)。各兵科中、下级军官出身行伍比例的高低,则似与该兵科召集教育的发达与否相关。

步兵向为国军主力,占中、下级军官人数 80%以上,值得作深入的观察。前引《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名簿》共收录步兵上校 1015 人、步兵中校 2159 人的资料,兹将其出身背景分别统计如下:

表 8 步兵上校、中校出身背景统计(1936 年)^①

阶级	样本数	黄埔	保定	行伍	其他
步兵上校	1105(100%)	160(14.48%)	294(26.61%)	53(4.79%)	598(54.12%)
步兵中校	2159(100%)	475(22.00%)	406(18.81%)	135(6.25%)	1143(52.94%)

上表显示,战前步兵校级军官的“黄埔化”,已获一些成果,中校以下军官出身黄埔已超过保定。另一方面,抗战时期步兵中、下级军官的素质,也有降低的现象,如表 7 所示,1944 年时,步兵中、下级军官出身正规军校者占 27.3%,而出身行伍者则增至 28.1%。另一项资料则指出,1937 年时,在一个普通的步兵营中,军官出身军校者占 80%,至抗战后期则降至 20%左右。^②

抗战时期,国军各部队由于背景不一,因此素质与战斗力也不一致。以训练、军官的素质、武器装备及给养而论,由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及黄埔学生所发展出的部队,在抗战初期为全国最佳的部队(日人称之为“中央直系军”),然后依次为其他的中央军、广西军队,原来的西北军及东北军、一部分的西北回军、粤军、晋军,再其次为云南、四川等其他的省军。^③

① 资料来源:根据军事委员会铨叙厅编:《陆海空军军官佐任官名簿》第 1 册,第 143—259、317—544 页所列的资料计算而成。

② 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 149.

③ 徐乃力:《抗战时期国军兵员的补充与素质的变化》,《抗日战争研究》1992 年第 3 期,第 53 页。关于抗战前夕国军各部队战力的评价,另可参阅防卫厅研修所战史室:《支那事变陆军作战(1)》(东京:朝云新闻社,昭和 50 年),第 104—105 页;刘凤翰:《论抗战前日人对中国军事之调查》,第 368—383 页;Carlson, *The Chinese Army*, chap. 6.

一般说来,中央军干部的素质较佳,虽然至抗战后期时“各级干部多不是本科出身,学工兵的可以带步兵,老百姓可以当军需,名册上什么都有,实际都是外行”^①,但是仍要较地方部队“识字的作参谋,不识字的作副官”为强。^②如抗战期间中央军已多能采用疏开队形运动,只有部分地方部队仍用传统的方式训练士兵。台儿庄之役,卢汉的云南部队即因仍用集中队形,伤亡甚大;西北马鸿逵、马步芳的部队,则直至抗战后期仍未采用疏开队形。^③

国军各部队素质和装备的好坏和其战斗力的高低并不完全一致。抗战前期,装备和训练最优良的中央核心部队,在上海会战中表现优异,在其他战役中,中央军个别单位虽有英勇事迹,但是整体而论,表现平平。至抗战后期,派遣至印缅战场的远征军由于有最新式的装备,严格的训练,及优秀的指挥,因此也有优异的表现。在地方部队中,广西部队及部分西北军的部队表现十分出色,临沂、台儿庄、徐州各战役最为人所熟知,即使是装备简陋的一些地方部队,也曾有良好的表现。可见战斗力并不一定完全取决于武器装备,士兵的爱国情操和指挥官的能力、决心等精神因素也很重要。

抗战时期影响中、下级军官(无论是隶属中央或地方部队)素质最重要的因素,即为所受的教育。如前所述,战时由于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教育品质下降,更重要的是,军校所教的,全是现代化、标准化的知识与配备,但是学生毕业后到了部队,却发现军中几乎完全没有现代化、标准化的装备,“许多装备、物品,连防毒面

① 汤恩伯:《部队的缺点在那里》,《汤恩伯先生纪念集》(台北:编者印行,1964年),第61页。

② 张麟潭:《弹火余生述》第2册,第177页。

③ 白崇禧:《白主任委员训词(二)》,见军事委员会校阅委员会编《陆海空军校阅手簿》,第61页;贾廷诗、马天纲、陈三井、陈存恭等访问兼纪录,《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第535、536页。

具在内,都好像旧货摊上的杂货,没有两件一模一样”。^①因此,在学校所学常感无用武之地,而对实际的问题,则毫无准备。

其次,国军的中、下级军官,一如高级军官,需要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于份外的工作。以连长为例,在其他的先进国家,一个连长仅需负责训练和作战指挥,其他的杂事一概不需要管。但是在中国则不同,连长除了训练、指挥士兵作战外,尚得兼管各项杂务,其中最令人烦恼的即为经理、病兵和逃兵。在经理方面,由于补给部门并非独立,连长之下虽有特务长辅佐,但是仍需花费很大的精力去计划柴米油盐、经费、弹药、装备等。^②病兵和逃兵更是所有下级军官共同的梦魇。战时一位驻扎于滇南的十四师排长,即曾回忆道:“我们下级军官最怕士兵生病。一天早上一个士兵眼睛发炎,第二天会有十个发炎,还怕他们偷农夫的玉蜀黍、煮食他们的狗。在当日的情形,实际上之考虑超过道德上之动机。因为士兵一有机会,必贪吃得生病。在滇南气温昼夜剧变、疟蚊遍处飞的情况下,小病三天,即可以被拖死。而且我们也害怕士兵携械潜逃。和我们驻地不远山上的土匪,就出价收买我们的步骑枪和机关枪,机关枪每挺七千元,等于我们一个士兵四十年的薪饷。很多部队长即在夜晚将全部军械用链条锁在枪架上。”^③

除了各种杂务外,令中、下级军官烦恼之处还包括和上级或其他机关打交道,尤其是“对有关之机关,接洽金钱、物品之事务,更是痛苦万端,心如刀割。部门繁多,头头是道,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四面八方,周流六合,均需应付裕如,最低限亦需立侍左右,强为欢笑,受官腔直如便饭,承官架何啻牛马。对起码科员、收发之类应如

① 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地北天南叙古今》(台北:时报文化,1991年),第130页。

② 张书麟:《我的军队生活》,《青年界》新5卷第2期(1948年3月),第30—33页。

③ 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43页。

此,股长、科长以及一切长更为低下”。^①这些人职位虽低,但是也不能得罪,因为他们如果要帮你,可以头头是道;如果要整你,也会花样百出。一位军界人士即有以下生动的描述:“盖科员以上的人员,随时均可将急如星火之公文掷入字篓或厕所中,再不然稍‘买帐’者,或不谙事实,或不明法理,不辨轻重缓急,一视同仁,沉着应战,此倭彼拖,如由死门入八阵图中。更不然,字里行间,断章取义,稍有不合,即万劫不复。且一事非一机关、一部门所能办了,每一机关、每一部门,类皆如此。”^②

一个中、下级军官,除了正常的训练、作战外,还有那么多事要操心,怎能一一都照顾周到?即使有能力,常常也无从发挥。因此战时一位在华停留多年的美军军官,即曾指出:国军军官“要是在中国行,在外国一定行。”^③中央军校出身的史家黄仁宇,也认为当时“如果让我们到英国、法国带兵,保证个个都是一流的军官”。^④

三 士兵

战前士兵的教育程度,迄今尚未发现较为详尽的统计数字,一般的印象是大多为文盲。社会学家陶孟和曾于1929年调查山西第三编遣区警卫旅的946位士兵,结果发现能自己写信者占13%,其余均未曾识字读书,或曾读书而不能写信。^⑤不过1938年8月,冯玉祥在湖南益阳检阅长岳师管区第三补充团,发现新兵识字者竟达八成左右。^⑥抗战时期,所征的兵的质量日益低下。根据一般

① 陈贤宗:《服务十周年回忆录》,《军需学校第七期学生班通讯》第9号(1947年1月),第25页。

② 陈贤宗:《服务十周年回忆录》,第26页。

③ 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44页。

④ 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台北:时报文化,1989年),第320页。

⑤ 陶孟和:《一个军队兵士的调查》,《社会科学杂志》,第1卷第2期(1930年6月),第115页。

⑥ 《冯玉祥致委员长支亥电》,《蒋冯书简》,第70页。

的观察,士兵不识字者,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无科学常识者,几占百分之百。^① 桂南作战之后,一位将领曾于宾阳测验一批由贵州拨补的新兵,结果发现文盲占 97%,至于那些 2—3% 的识字者,程度也不够作文书上士。^② 1941 年,据第十四师排长黄仁宇的观察,新兵“不仅体格孱弱,而且状似白痴,不堪教练。师部的办法即是抽调各营连可堪训练的士兵,组织突击队,集中训练,其他的则归各部队看管,也谈不上训练,只希望来日作战时在山上表现人多”。^③ 一般的部队对于新兵,一方面要施行军事训练,另一方面则要补行国民教育,如教一普通士兵认阿拉伯数字,需 2—3 星期,认米突尺需 2—3 星期,讲弹道抛线也得 2—3 星期,要教到会射击,则往往需 2—3 个月。^④ 抗战后期,有些部队曾对士兵的教育程度加以统计,但是数字的可信度颇有问题,如以下二种统计中有关文盲的比例,即有相当大的不同。

表 9 抗战时期士兵教育程度统计^⑤

	文盲	初识字	小学	初中	高中	总计
陆军第十四军(1945)	29%	46%	22%	3%	0	100%
陆军荣誉第二师(1946)	5.2%	45%*	49%	0.5%	0.3%	100%

* 指能识五百单字表者。

上表所举荣誉第二师,系由康复伤兵所组成,其中老兵较多,因此识字者也较多,应是造成文盲比例较十四军为少的原因之一。

各部队士兵的知识程度虽有不同,但是均面临逃兵的相同问题。由于逃兵风气的普遍,各部队在教育上,计划和实施每不能一

① 刘峙,《建军的基本条件》,《建军导报》,第 1 卷第 2 期(1944 年 8 月),第 6 页。

② 戴坚,《士兵识字教育实验谈》,《军事杂志》,第 162 期(1945 年 1 月),第 38 页。

③ 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 141 页。

④ 青年军人丛书编辑委员会编,《青年远征军剪影》(重庆:军事委员会全国知识青年志愿从军编练总监部,1945 年),第 135 页。

⑤ 资料来源,《陆军第十四军军务处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见《陆军第十四军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书》(重庆:陆军第十四司令部,1946 年),第 214 页,同仇汇刊社编,《陆军荣誉第二师三周年纪念特刊》(海防:陆军第二师政治部,1946 年),附表。

致,更不能施行有系统的一贯教育。换言之,即一年四季均在新兵教育课程中徘徊。在步兵方面,较好者尚可练成班、排的战斗教练,至于特种兵部队,则对此也不可指望。^①

1944年,政府号召知识青年从军,经检验合格者,总数达125500人,惟因战事及交通运输关系,实际报到入营者不及100000。学历程度计专科以上占10%,高中以上占23%,初中占60%,小学占7%^②,对于军人形象的提升,助益颇大。

在经济背景方面,由于士兵的社会地位低落,所以战前入伍当兵者,多为贫困人家的子弟^③,平常人家如有子弟当兵,常会被讥为“没出息”;也有许多人不愿意将女儿许配给军人。^④战前虽然实施普遍的征兵制,但是由于有知识、有钱、有地位者,可以逃避兵役^⑤,以致各地征送的壮丁,多为贫者、愚者和弱者。至于士兵家庭的职业,试将搜集所得资料列举如下:

表10 国民政府时期士兵家庭职业统计表^⑥

单 位 \ 职 业	农	商	工	公	教	军	其他
第三编遣区警卫旅(1930)	79.8%	9.4%	2.9%	—	0.1%	—	7.7%
陆军第十四军(1945)	78%	8%	6%	1%	4%	2%	1%
陆军荣誉第二师(1946)	66%	12%	5%	5%	3%	3%	6%

- ① 杨安铭:《对步兵教育应有之认识》,《军事杂志》,第166期(1945年6月),第2页。
 ② 陈曼玲:《抗战与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见军史研究编纂委员会编《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册,第876页;陈存恭:《青年军的征集与编组》,见青年军史编辑小组编《青年军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编者印行,1986年)。
 ③ 根据陶孟和1929年对山西一部队946名士兵的调查,士兵自认家庭贫穷者占73%,将足用度者占24%,有余者占3%。参阅陶孟和:《一个军队兵士的调查》,第115页。
 ④ 谭继禹:《戎马琐忆》(未注出版时地),第7页。胡静如:《烬余拾报》,第33回。
 ⑤ 《关于兵役的话》,《大公报》,1942年10月14日。
 ⑥ 资料来源:陶孟和:《一个军队兵士的调查》,第99页;《陆军第十四军军务处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第214页;同仇汇刊社编:《陆军荣誉第二师三周年纪念特刊》,附表。

上表所列前二种统计数字颇为一致:出身农家者约占 80%,与整个社会的务农人员比例接近。^①至于第二师士兵出身农家者较少,或许是由于原务农的士兵受伤后,离开部队返乡者较多所致。

军界人士多认为出身农家的士兵,具有朴实、勇敢、服从、坚毅,以及吃苦耐劳等各种美德。^②根据战前一位美国军事观察家的观察,中国人“是作军人的极佳材料,具有无穷的耐性,高度的服从权威,加上一个强壮、不易生病的体格。如能加以适当的训练和配置,让他吃饱穿暖,定期有饷可拿,即便是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也将是个好士兵”。^③战时在华的外国人士,也多有类似的观察,如史迪威 1942 年 5 月 26 日呈蒋委员长文中,即指国军“一般士兵温顺,有纪律,惯于吃苦,服从领导”。^④7 月 7 日,他在对华广播中对于国军士兵,更是称道有加:“对我而言,中国人的伟大——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他们无怨无尤的忠诚、他们的认真、他们的坚苦卓绝——由中国士兵身上最可看出。他备尝艰苦而不掉一滴眼泪;上级带他到那里,他就跟着去,毫无迟疑;在他简单而率直的心灵中,从未想过他作的并不是英雄作的事。他要求的很少,而永远都准备付出所有。”^⑤美军的参谋总长马歇尔也相信,如果中国的士兵能被适当的领导、喂饱、训练、装备,他们的战力将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的士兵一样。^⑥

不幸的是,抗战期间军中的生活水准下降,士兵的体格也随之

① 根据刘大中和叶孔嘉的估计,1933 年时全国 7—64 岁的就业人口(working population)中,从事农业者占 74.9%,男性就业人口中,从事农业者占 74.9%。参阅:Ta-chung Liu and Kung-chia Yeh, *The Economy of the Chinese Mainland, National Incom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1933—195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82.

② 白崇禧:《现代陆军军事教育之趋势》(出版地点不详,1945 年),第 107 页。

③ *U. S. Military Reports, China, 1911—1941, Reel V, April 30, 1928.*

④ 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153.

⑤ Theodore H. White, ed., *The Stilwell Papers*, p. 130.

⑥ Romanus and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 p. 386.

恶化,尤以抗战后期最为严重。如1943年国军派送1800名新兵至蓝伽(Ramgarh)受训,其中竟有68%因体格不合标准而被拒绝;另一批被指派参与蓝伽计划的200人,先是被中国医官淘汰了65人,继而又被美国医官淘汰了30人,最后只有105人被录取。^①国军士兵体格之差,由此可见一斑。

在年龄方面,根据现有的少数资料显示,国民政府时期的士兵,大多为年富力强的青年,如1932年时,第十九路军教导队士兵的平均年龄为24岁。^②以下二份较为详细的数字资料则显示,国军士兵中三十岁以下者占90%左右,其中尤以20—25岁者最多。

表11 第三编遣区警卫旅士兵年龄调查表(1930年)^③

年 龄	15—19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总 计
人 数	144	405	279	74	24	7	3	936
样本数	15.4%	43.3%	29.8%	0.9%	2.6%	0.7%	0.3%	100%

表12 第十四军士兵年龄统计表(1945年)^④

年 龄	15—20	20—25	25—30	30—35	35—40	40—45	45—50	总计
人 数	3535	10925	10560	2329	187	64	5	27605
百分数	12.8%	39.6%	38.3%	8.4%	6.8%	2.3%	0.2%	100%

以上二表显示,士兵固然多为年轻人,但是或多或少也有一些老兵。这些老兵多为战前所募,当时曾经过一番挑选,部分系久经战役,每能尽忠职守,即使因为分散配置,为火力占优势的敌人所击溃,数日之后,仍能自行前往指定地点集合,各归建制,严整如初,

① 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 141.

② Lary, *Warlord Soldiers*, p. 39.

③ 资料来源:陶孟和:《一个军队兵士调查》,第95—96页。

④ 资料来源:《陆军第十四军军务处三十四年度工作报告》,第215页。

对整体战力毫无损伤。^① 因此各部队的干部,对于老兵多十分重视,如一位炮兵排长即称老兵是“国之瑰宝”^②,另一位步兵排长则认为“如果作起战来,只有这样的兵员才能算数”。^③ 对于这些老兵,在战前尚可以用升官加薪的方式施予奖励,但是战时军人真实薪俸下降,1941年少尉月薪42元,下士20元,还要扣除副食费,而在街上吃碗面,即需3元,所以利诱的力量不充分,但是也不能威胁,如果让他们在兵众面前下不了台,则会“开小差”投奔其他部队。各部队为了留住这种人才,只得给予特殊礼遇,即使是连长,也要对他们客气几分;军校出身的年轻排长,更是要陪他们吃狗肉、说粗话^④,有些部队对他们甚至早晚不集合训话,也不出操,尽量让他们轻松愉快,以示优待。^⑤

在一些地方部队(如刘汝明、孙连仲和丁治磐的部队),老兵颇多,班长职位多由其担任,很受士兵的敬重,称之为“头目”。由于老兵对于部队战力的发挥十分重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部队战力的高低每与其老兵的多寡呈正比。如东北军系统的第五十三军,自七七事变开始,直到1947年调至东北战场时,尚有半数以上是老兵^⑥,在当时是罕见的情形。

士兵征募方面,中国近代兵源一向为募兵,至1936年起始推行征兵制。^⑦ 抗战爆发后,亟需补充大量兵员,乃采用征募并行制,如1939年至1940年9月,共募集志愿兵近80营,各省又陆续将

① 刘凌云:《天井关保卫战——刘元勋将军歼敌纪实》,《山东文献》,第13卷第4期(1988年3月),第103页。

② 张曙光:《血战余生》(台北:商务,1985年3月),第43页。

③ 黄仁宇:《阙汉骞和他的部下》,第142页。

④ 同上,第141、142页。

⑤ 张曙光:《血战余生》,第43页。

⑥ 刘凌云:《天井关保卫战——刘元勋将军歼敌纪实》,第103页。

⑦ 详见卓文义:《艰苦建国时期的国防军事建设——对日抗战前的军事整备》,第8章;沈怀玉:《近七十年来中国之兵役制度》,《国史馆馆刊》,复刊第8期(1990年6月),第75、76页。

监犯 35000 余名调服军役^①,不过主要的兵源仍为征兵。计自 1937 年抗战初起,至 1945 年胜利之日止,全国实征募壮丁人数,共为 14049024 人。^② 学者刘馥曾比较二次大战期间,列强军事人力动员的情况,结果发现中国的动员率(mobilization index,指平均每年动员人数在人口中所占比例)仅有 0.4%,而日本为 1.3%,英国为 1.4%,美国为 2.4%,俄国为 3.0%,德国为 3.8%。^③

战时中国不仅在军事人力动员的程度上,比不上其他国家,征兵政策推行的过程中,又曾发生许多的困难和流弊^④,其原因在于实施征兵所需的各项基本条件,在此时的中国社会并未具备,不能与征兵政策相配合。其中最重要者如下:第一,户口行政不发达,以至影响壮丁调查工作,不仅无法取得有关人民的性别、年龄、疾病、职业、教育程度等资料,以为起、转、停、除、缓、免、禁役之参考,且无从分析各地人口组合,以作为分配名额的标准。第二,地方基层干部欠健全,对于兵役法令奉行不力,办理役政时,或为宗族姻亲情感所钿蔽而不肯征,或被豪强凶焰慑而不敢征,或收权贵贿赂而不愿征,影响征兵成效甚巨。第三,国民所得普遍低,奉召入伍后待遇又不良,家庭生计顿时无法维持,使得一般民众视当兵为畏途。第四,国民知识水准不够,社会上仍流行“好男不当兵”的观念,对于征兵制度的真谛并不明了,往往规避兵役。^⑤

四 结论

以上,笔者对抗战时期国军各阶层成员的出身背景及素质,作

① 许高阳编:《国防年鉴(第一次)》第 2 编,第 36—38 页。

② 同上,第 2 编,第 35 页。

③ Liu, 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China, p. 135—136.

④ 徐乃力:《好男应当兵:对日抗战时期中国的军人力动员》,见《孙中山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85 年),第 4 册,第 6—9 页;侯坤宏:《抗战时期的征兵》,《国史馆馆刊》复刊第 10 期(1991 年 6 月),第 161—172 页。

⑤ 何应钦:《军政十五年》,第 90、91 页;侯坤宏:《抗战时期的征兵》,第 165—169 页。

了初步的量化分析,此处拟再就各阶层军官的素质及行为模式,略作比较。1942年5月26日,史迪威将军曾向蒋委员长提出一份改革国军的计划。计划中认为国军应精简编制,配赋充分的武器装备;更换无效率的高级指挥官,并充分授权不加遥制云云。其内容,实未超出战前德国军事顾问建议之外。事实上,当时中国部分军队尚存有地方派系色彩,平时裁汰,尚虞酿成风潮,在战时此种断然措施,在政治上自不能立即施行。^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史迪威在计划中曾对国军的各阶层,作了概括性的观察。他指出,国军一般士兵温驯、有纪律、能吃苦耐劳、服从领导;低级军官对于命令,每能迅速执行;营、团长个别差异极大,不过也不乏优秀之士。他认为上述各阶层如要汰弱擢强,将不是难事,且可提高士气。至于师长和军长阶层,则是个大问题(详见上节)。^②委员长本人也曾多次公开指称国军高级干部的知识、能力和精神,与其阶级职务不相称。二人的目的虽然均在指责高级将领,但是从中也可看出,中、下级军官的表现要较高级军官为佳。接替史迪威职务的魏德迈,则认为战时低级军官的表现比过去进步,主要是由于战前国军设立的一些兵科学学校水准颇高所致:“(国军)为低级军官设立了许多极佳的(excellent)学校(包括步兵学校、炮兵学校、辎重兵学校、机械化学学校),有助于培养较佳的军官。”^③

笔者认为,造成各阶层军官素质及表现上差异的因素,除了所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和品质的好坏外,更重要的是所受升迁、奖惩等人事制度激励或约束作用的大小,值得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④

(作者单位:台北近代史研究所)

① 梁敬铎:《史迪威事件》(台北:商务,1971年),第66页。

② Remanus and Sunderland Stiwell's Command Problems, p. 153.

③ Wedemeyer Report, p. 325.

④ 拙著:《抗战时期的国军人事(1937—194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即将出版)一书,即拟对此一问题加以探讨。